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

郑鹏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DE ZHUTIXING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

郑 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郑鹏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649-0484-5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518 号

责任编辑 李 云

责任校对 齐丹锋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88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什么是“主体”?	(1)
二、什么是“主体性”?	(3)
三、中国当代文学与主体性问题的相遇	(8)
第一章 话语的变迁与主体问题的兴起	(13)
第一节 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向	(13)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思潮中“人”向主体的过渡	(20)
第三节 文学的技术与主体的构造	(29)
第二章 主体性:深刻的变革	(39)
第一节 当代文学的主体抉择	(39)
第二节 异化的主体,还是“社会主义新人”?	(46)
第三章 再反思:文学的主体性	(55)
第一节 个体主体性:黑格尔背后的康德	(55)
第二节 整体主体性:康德背后的黑格尔	(66)
第三节 一种模式,两次论争	(76)
第四章 主体性的文学景观	(83)
第一节 “小说愈来愈有可写的了!”:新主体与新世界	(83)
第二节 “你不可改变我”	(91)
第三节 知青主体的浪漫与失落	(100)
第五章 主体性的衰落	(107)
第一节 “文学家”的消失	(107)
第二节 切近自我:面向个体的“写作”	(112)
第三节 90年代后文学中的后政治主体	(118)
第六章 主体的新空间	(126)
第一节 城市的形式与主体的形式	(126)
第二节 最后的能动性:主体性的道路	(134)
余 论	(141)
参考文献	(144)

绪 论

主体性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恐怕也是最为多义和含混的词汇之一，它以其歧义丛生的复杂性不断牵动着人们反叛和辩论的神经；与此同时，这个哲学化色彩异常浓厚的术语却也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成长中的核心关键词。从基本哲学内涵上说，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它意味着在主客二元对立中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性质；其次，它描述了主体所处的某种存在状态。然而一旦用在文学领域，这种哲学的清晰性却变得面目全非。人们总是习惯在不同的语境和含义上去使用这个词，却并不急于给它一个明晰的定义，它是哲学的，同时更是实用的。理论家与评论家刘再复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涵盖了作家、评论家、读者、文学作品等多重含义，武断地在人物、文学系统、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新、文学的独立性等各种对象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从此以后，对文学的主体性的界定和使用就显得更为混乱和随意。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脉络以及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在其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真审视这个习焉不察的术语，给它更严谨而合身的限定，对它进行专题性的梳理，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重新赋予它新的、更有力的界说和更充实的内涵提供基础和准备。

一、什么是“主体”？

主体性这个词来源于西方哲学体系，但它并不是从古到今都存在的一个概念。为了理解主体性，让我们先看看现代主体这个概念。谈到现代主体，我们习惯于把它理解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存在者。这其实是在现代思想的意义上来说的：理解主体就是理解人本身。然而在古希腊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中，一般是把“我”、“自我”、“主体”等概念看做如同石头、鲜花和大地这样的事物的

实体性的概念的。哲学来源于神话,在哲学思维出现的早期,它还不能彻底摆脱神话的影响,还留有浓重的神话思维的影子。虽然希腊神话中有众多名扬四海的英雄形象,但是他们都不能逃出众神的掌控和命运的安排,人、英雄甚至是众神的一切总是无法摆脱在冥冥之中某种操控一切的神秘力量。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创立的哲学有以下一些基本的假设一直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反复出现:1.存在着许多的事物或者物体(而不是创世之初的虚无或者混沌一团);2.这些事物或者物体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世界;3.这个世界是遵循着某种秩序构成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4.这个世界有一个第一原因,即本原……这些前提意味着在我们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以前,一个有着起源的秩序井然的世界已然存在。当我们说“道路”的时候,这个词天然的与大地上供人与车马通行的条状地带等同,它与一个人从此至彼的行进并没有关系;当我们思考道路的时候,这个词天然的已经有了对应的对象,甚至“道路”这个词的背后已然有了古希腊的赫耳墨斯,或者中国的土地城隍这样的对应的“道路之神”。它是我们上路前“骖祭”跪拜的对象、行动中遵行的对象,路是人要走的,而不是人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与神话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事物、世界、秩序、本原作为条件不可追问。^①在古代哲学家看来,实体并不等于主体,人本身也从属于这个序列。实体的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被列为“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首,它意味着在时间中永恒不变的事物。

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开始,人的因素才被引入哲学思考之中。^②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二元分立,正在思维和怀疑的“我”是世界真实存在而不是变成庄周梦蝶的前提。“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种与古典形而上学不同的哲学同一性。古代哲学把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风以及精神和诸神等等,而笛卡儿却把这个权柄收归到人的手里,空前地重视人的思维和认识的重要性。这就是西方哲学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向。休谟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客观世界、实体自我和本质规律是否存在超出经验的范围,我们无法判断。因此他既不肯定精神,也不肯定物质。在伏尔

^① 谢遐龄:《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8页。

^② 关于现代主体的产生过程可以参看〔德〕彼得·毕尔格的《主体的退隐》(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现代主体的发现: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儿、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书把主体退隐的历史也划归到了主体哲学里面来叙述,认为主体的消解运动同样属于现代主体性场域的一部分,是这个场域不可分割的两极之一(参见第十五章“结语”),甚至在“谱系学”中主体的退隐先于其构成的历史(第203页)。

泰、狄德罗和卢梭这些启蒙思想家那里,以理性的名义睥睨一切的启蒙主体开始生长起来,在他们眼中现代主体“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不过在他们那里理性的自我受到过度肯定而自然的自我属性则被贬抑。^① 为了抵抗休谟的经验论的怀疑主义,为人类认识的同一性奠定基础,就得重新研究笛卡儿提出的“我思”与理性主义者高扬的“理性”,所有这些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康德。康德判定“物自体”不可知,外部现实不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人的心灵中存在着世界真相构成的先天法则,“我”不是实体的事物,也不是实体的灵魂,“我”是作为万物之源的自发的行动的自我。在康德那里,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的精神被大大地发扬,特别是在实践理性的层面,被笛卡儿分离开来的“我”自身与思维本身在道德实践活动中结合在了一起,在主动参与世界的“行动”中,人的自由、人的道德与人的自然天性弥合无间。至此,在哲学中,人不再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实体,一个行动的主体诞生了;世界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把自我实体化,所谓“太初有我”,不容置疑;哲学家们也不再像笛卡儿那样,以“我思”把自我与存在隔绝起来,自我的本质越来越被理解为行动者、能动者和自发者,从而催生出“太初有为”的积极的自我观;哲学对世界万物的思考不再遵循着某种神话般神秘的外在于“我”的法则,而是必须从“我”的内在法则出发去理解。康德以后,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都发展了康德的主体的哲学,乃至到海德格尔哲学“从名词的存在者向动词的存在本身、从客观的真理向去蔽的真理回溯”,都高举了“实践哲学”的旗帜。^② 主体性这样一个刻画能动主体特性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出现的。

二、什么是“主体性”?

在上面提到的哲学家那里,主体性这个词作为理论的提升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它的流行是很晚才出现的事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去对它进行分析。在《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③中对 subjective 列举了 8 项词义,对它们的分析和阐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主体性这个词所包含

① [德]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8 页。

②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192 页。

③ 参见[美]斯图尔特·B. 弗莱克斯纳主编:《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编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2209 页。

的最基本的内容。合并词义后,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第一,最常见的意思就是与 objective(客观的)相反的意思——主观上的,这也是哲学上的含义。主体性,英文 subjectivity,这个名词从语法上来说衍生于 subjective(主观的、主体的)这个形容词。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是把 subjective 与 objective(客观的、客体的)这个词放在一起分析的,哲学中 subject(主体、主观)与 object(客体、客观)的二元对立是它们演化的基础。在这个英文词的产生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对其词义的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它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唯心论(idealism)与唯物论(materialism)传统的浓厚的印迹。^① 在近现代哲学和日常的运用中,objectivism(客观论、客观主义)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对外在世界错误的观念,这种对外部的过分强调忽略了“内在的”和“个人的”世界。正是在对 objectivism 的批判中,subjectivity 这个词才最终衍化出来。^② 这就意味着主体性问题的出现还存在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的原因。这个意思还经常翻译为“主观性”,但这个主观性是在万物皆着“我”色之外还有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实现自我主体地位的意思。世界存在的“主观性”特征使“我”的能动活动更有信心。

第二,《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最后一项词义是废止不再使用的意义“被支配者的;顺从的”。这个含义来源于它的拉丁语 subjectiv(us),subject(um)。而 subject 在拉丁语中可追溯到最早的词源 sub(在……之下)与 jacere(投、掷),含义为“被统治者或君王管辖之下的人民”,这个意义仍然在形容词和动词的意义上被使用。^③ 既然“顺从”,就必然有相互共存的服从者与统治者。这种顺从的关系中,服从者不能脱离统治者,因为他身处劣势,他的顺从必须有一个高于自己的对象存在;统治者也不能脱离服从统治的人,相反只有不断显示自己相对于对象的优势来“胁迫”或者“召唤”对象成为服从者,他才能拥有统治者的身份。这种统治者争取被统治者“承认”的结果,就是一种人的身份的重新定义。历史上 subjective 这一意义的形成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福柯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他把教士的诱导训诫当做从古代主体

①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73~479页。

② 同上,第473~474页。

③ 同上,第479页。

向现代主体演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①。阿尔都塞在他的名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也突出地以基督教意识形态“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为例对主体问题进行了论述。^② 如果比较宽泛地把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增强当做主体性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强调精神驯服的基督教内部也是现代主体诞生的重要场所。在马丁·路德写的名作《基督徒的自由》(1520)中调和了心灵的自由与受捆的奴仆两种形象:“1.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2. 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辖。”^③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新的、属灵的、里面的人”,他不受天主教教阶的束缚,通过亲自阅读《圣经》接受上帝的启示“因信称义”,享有“属灵的真自由”,在基督里面生活,做自己的“祭司”与“君王”。^④ 这个“里面的人”(inward man)是主体性所倡导的“内在的个人”的原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反映了中世纪与现代早期自我意义的危机,又为现代的自主的自我与主体开拓了解放的道路。^⑤

第三,内在的、本质的。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康德那里,主体这个概念才开始真正丰满起来。在他的手里,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近代转向有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之后,人们就可以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可以被认识和理解,是因为能够自由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人”而不是其他任何的神或者权威。这就是人自身在西方哲学中真正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的开始。在康德那里,围绕着行动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其他实体,某种可以被称为“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渐渐成为人文科学的关注对象,人道主义也是到此时才具有比较完整的含义。历史上,这种人的主体意识浮出水面的趋势,整体而言是从15世纪伴随

① 福柯本来把此内容命名为《肉体的忏悔》,将之作为《性经验史》的第四卷出版,但是最后没有修改定稿。有一部分内容收入余碧平译的修订版《性经验史》第四卷“为贞洁而战斗”。参见《性经验史》(修订版),余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其中福柯着重论述了教士宣导的性伦理所有的一种“主体化”的过程,参见第498~499页。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参见“一个实例:基督教意识形态”一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372页。

③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分别参见第3、5、28、12页。

⑤ Donald E. Hall, *Subjectiv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5.

着西方航海时代,也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新“发现”所产生的对世界的新的认识不再意味着古希腊古罗马的对理念(idea)的回忆(柏拉图),从“太一”或神那里流溢出的(普罗提诺)理智、灵魂和物质以及中世纪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启示,而是意味着属于人的“知识”。“知识”这一概念的产生也是在认识世界和发展科学的前提下新的征服和臣属关系的产生。在以前的人类文明中,征服和臣属首先的含义就是杀戮、战争和“朝贡关系”;而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它首先意味着新的认识和知识,基督教传教的狂潮是在知识的引导下对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二元对立关系的新的“配置”,探险家、殖民者、学者和传教士首先用他们的游记、风俗志、博物学、科学体系和多语种的《圣经》翻译建立起开化者与被开化者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从知识到文明的从属关系。对人的精神内部也存在一个这样对应的“发现”、开发与征服的过程。培根认为人相对于其他存在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而最重要的知识则就是对人本身的认识。要在新时代建立人类支配自然的“培根式乌托邦”^①,就必须使人获得自我的实现,这就是“启蒙”,必须把人建构成一个启蒙的主体,在其中知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对人而言启蒙的根本目的则是要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②。与科学知识寻求确定性的方向相一致,启蒙的主体也必须是明确的、同一的。由于启蒙要建立的是一个不依赖外部力量与权威的自我,因此不能从外部给这个启蒙主体寻找依据,那么这种确定性就必须重新回到人的内部、人的内心去寻找,这就是一个“内在的个人”。

第四,个人的、独自的,这和下一项含义“强调或依赖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是相关的,它们都提示我们主体性问题与现代个体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康德哲学中,康德通过理性批判清理了旧形而上学的迷信的“牛圈”,他大胆地用哲学的提问向陈腐混乱的旧思想提出挑战:“人能够做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他不只是用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自由(道德)如何可能”和“审美如何可能”的回答为人的有限性存在廓清了边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方式第一次试图提出“人如何可能”这样一个最高的问题。人是一种复杂的存在物,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的存在的多变的“内容”和人的稳定的存在的“形式”区分开来,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的纯粹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那个关于

①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第1页。

“人如何可能”或者说“人是什么”的最高的问题。^①

这个“主体的纯粹形式”就是“自我中心”的现代个体主义最抽象的哲学原型。就像马克思从《鲁滨孙漂流记》中可以看出孤岛上的唯一幸存者还依然是一个资产者一样,这个康德主体性原则下出现的“纯粹形式的个人”,也依然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构成物。在自由平等的法律契约之下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基石与核心价值。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思想主体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义所“传唤”的意识形态主体的自由、自律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应关系,阿尔都塞认为这个主体从来都是由意识形态从个体中传唤而来的,意识形态对它进行承认的同时也是对其的误认,因为它们从来都是抽象和无物空洞的。^②然而正因为其抽象和空洞,它才更容易被操纵和塑造,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财产所有人、纳税人、公民、法人、生产者、消费者、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多重的社会角色。资本主义首先要求个人占有他自己,成为他自己,对他自己和其行为负起责任,成为一个“主体”,随之才能够让资本和环境反过来再占有他本身。关于这个被囚禁在“个人”中的主体,也是很多反主体论的思想家集中反驳和消除的对象,然而主体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一样总能够给自己找到奇妙的“幽灵”的形体复活在无数的子嗣们的面前,^③在后期福柯那里他换上“关心自己”的外衣,而在哈贝马斯那里他的名字是“交互主体性”或者“主体间性”……

第五,从语法上来说,subjective 主语和主格有关,即是谓语、形容词、宾语等要指称、说明、描述的对象。他被认为是先于语言表达而存在,是语言言说的源头。主体性首先要说的就是主体的世界,是所有语言、文化、制度等建立的起点。然而正是这个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主语的、主格的”语法词汇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哲学思考与语言扯不开的联系。

哲学代替神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的过程正好也是主体性慢慢生长成熟的过程,而主体所处的那个位置——一切知识和理性的中心和起点,正是以前上帝在神学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可能给我们一种印象:主体性伴随着哲学文化而兴起,是“哲学之梦”代替神话和“神学之梦”的产物。这其实正是很多当

① 陈家琪:《主体的纯粹形式与文化人类学》,张世英、朱正琳编:《哲学与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美]弗莱德·R. 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钧、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参见第一章《占有性个体主义的超越》。

代哲学家对主体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罗蒂以及其他所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家都在对这种大写的哲学与大写的主体提出质疑。最关键的可疑点就是它们都是在忽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的限制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属于应该保持沉默的无法言说的对象,或者是他在早期判定的语言用法的错误。德里达把它总结为“声音中心主义”,罗蒂则认为这是一种对一系列终极词汇的寻找。罗蒂说:“它突出了一个古老的希望:即对这样一种语言的希望,它不可能再接受注释,不需要再被解释,不可能被以后世代抛在后面和加以讥笑。它是对这样一种词汇的希望,这种词汇内在地和自明地是最后的,它不只是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广泛、最富成效的词汇。这样一种词汇将必定适宜于为全部历史和全部现代文化‘设定其地位’。”^①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在这些当代哲学家眼里仍然属于这个古老的梦,但无论这些激烈的批评意见怎样彻底,主体性问题仍然作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常见主题与用语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不能排除我们重新对它进行阐释和应用的可能性:哲人建立哲学体系总像是在描述一个上帝的永恒的宇宙,而结果却只是为我们留下历史与他们个人的伟大痕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我们无法再构筑“主体性”理论的庞大体系,但是在与我们的时代和生存紧密相关的细节处,人的主体性问题永远都存在灵活的可塑性,我们总是能把“古老的公式,重新解释为更广泛原理的特别表现,这些原理的现在形式和表述方式,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见过的”^②。

三、中国当代文学与主体性问题的相遇

回到中国当代的语境中,主体性这个词显得更复杂而难以捉摸。它身上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子仍然显而易见,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下讨论这个词几乎就等于讨论康德与黑格尔两大德国古典哲学高峰之间的消长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康德的地位一直被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中,同时他又处在马克思主义直接继承的黑格尔哲学之前,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脉络中,康德被黑格尔巨大的阴影所笼罩。因此,每一次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思想论争都会试图颠倒这个次序,因此“回到

①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9页。

② [美]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页。

康德”成了对新儒家影响巨大的新康德主义、第二国际右翼与反思列宁传统的修正主义(指可以上溯到伯恩斯坦等人的思想)、反思斯大林传统的左翼非主流思想等各种思想潮流共同的口号。康德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反抗历史决定论的一面旗帜出现在愁云惨淡的黑格尔传统的众多中国诅咒者的队伍之中。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每次“反右”运动和反修正主义运动都会把康德拉出来作为陪练。然而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经常把主体性问题与康德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是比起康德,黑格尔更常使用这个词语,正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哲学史演讲录》、《法哲学原理》和《美学》中的广泛运用,才使得它在中国这样为人所熟知。

黑格尔把主体性看做是精神自身矛盾分化过程中与客体性、客观性相对立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客二分中主体的、内在的那一方。他高度评价主体性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主体性在自由地把握思维与自然的过程中把世界当做“我们的东西”,因而“不承认任何权威”,因此它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和“近代哲学的出发点”。^① 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个人主体性的表面性与偶然性,他又把主体性分为有限的主体性与无限的主体性,强调主体与客体在理念发展中的最后统一;在法哲学中,他把主体性放在客观精神发展的过程中,把这个过程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阶段,在强调社会集体的“伦理”阶段又将之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层次。^② 这都深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面貌。黑格尔那里没有脱离精神辩证运动的个别的孤立的与一般性无关的个体性的存在,这种形式存在的个体甚至被认为是“死的现实”^③。正因为黑格尔那里没有康德的“人如何可能”的哲学人类学的问题,这种辩证发展的思想才使得他的主体性思想很容易被中国新时期的文化界和理论界看成是偏向“大我”而牺牲了“小我”,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突出抽象的历史而看不到鲜活的生命。在“文革”之后,反思黑格尔的“假的”主体性,重新在集体主义之外找到“人”的尊严,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反思集体主体性也成为反思带有强烈毛泽东文艺思想色彩的文学理论思想中的反映论、阶级论等的一个讲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以来也是遵循走出集体主体性束缚,不断追寻个性发展的空间与道路的线索。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3页。

② 参见张世英主编:《黑格尔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2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242页。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体性这个词在新时期“重新发现个人”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才真正成了一个“问题”。它是西方主体性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再现的时候“中国化”的过程。主体性在西方语境中的基本含义虽然仍以各种方式保留下来,但是它面对的问题却已截然不同。特别是当这个哲学问题转化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时,新时期文学面临的理论危机与当下的文学现实碰撞在一起,使文学发展中的各种深层矛盾深刻地表现出来,给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对文学反映论的批判、文学的创新、文学发展道路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作家身份与文学体制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紧密相关,因而才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主体性问题这20余年丰富多彩的因缘关系,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继续思考的空间。经过长达20年与主体问题的遭遇,可以说文学与主体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的本土问题与本土经验之一,这也是本书论述的角度。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后,怎样看待文学视野中作家、读者、批评家以及文本这样的文学世界与主体的关系,怎样理解花样繁多的文学终结论与作者死亡论之后当代作家的“主体性”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仍新鲜灵动、尚难进入文学史的论述的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主体性一直是一个总体化的哲学和文化术语,在文学界具体使用中,与新时期出现的众多“描述性”的词汇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自我定义的特性。它不是力图去总结一种社会存在,我们无法仅仅在归纳的意义上使用它。在已经被外部规定了的范畴里面对社会存在进行总结归纳,无法解释这个术语在文化、政治、思想等领域被如此灵活多样地使用的状况。例如,我们可以说文学现代派所追求的冲破旧有的文学模式和意识形态制约的文化创新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但是在分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无所不在的刻意模仿的时候,这种“主体性”又变得可疑起来。它似乎更倾向于逻辑的演绎,并且是出于自我内在需要的自我演绎。同时,它又是一种价值的自我肯定。如果说中国当代作家对“意识流”这种文学方法的借鉴是文学主体性的体现的话,那么人们在无可奈何地又对“东方意识流”与《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的“意识流”的差异进行褒扬或者贬抑的时候,这种“主体性”就更多的具有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立场和背景出发的重新定义和价值认定的意义。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追溯,学者们对施蛰存、刘纳鸥、穆时英、废名、汪曾祺等现代文学作家早期实践的研究却再一次削弱了新时期“意识流”文学创新的价值意义。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具有的“主体性”价值在逻辑演绎和自我的价值认定的意义之外不断受到置疑,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一种更为复杂的角度对它重新进

行审视。80年代的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似乎内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无论存在与否,它都在努力造成一种印象:作家和评论家们具有主体性的文化存在,他们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他们的主体性使他们能够能动地、自主地、出于内在需要而不是外部强制地从事文学实践的活动。这种倾向包含两种含义:其一,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社会已然能够容纳不受外部力量完全操控的个体,他们独立或者部分独立于其他社会存在,能够主动地对它的社会本质、活动范围、存在意义进行自我确证;其二,这种主体的所有实践活动又先天地能够符合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可以整合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工程中去。文学是一种多功能的实践活动,通过文学,知识分子既实现了自我,又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新时期的文学与前三十年的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新时期以前我们更常见的是与客体相对应而言的主体概念,并没有把主体当成一种独立的性质或者特征来理解。如果谈论当代文学中的主体问题,那么我们讨论的范围必须囊括新中国建立以后阶级话语、政治话语以及国家话语中对不同主体的论述,然而真正的主体性问题却只是“文革”以后才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本书认为,新时期的主体性问题其实正是建立在批判、遗忘和转化前三十年和“文革”时期各种话语问题的基础上的,正是通过主体性这样一个巧妙的角度,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进行文学的反思和研究,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在创作方面,文学的主体性被认为反映在各种各样的创作现象中,这使得作家与评论家自如地活动于新出现的文学场之中,他们感觉到这里天然的就是他们展示才华的绚烂舞台。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如此,90年代文学边缘化、市场化以后依然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促使文学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变的最终完成。

提到文学的主体性,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围绕刘再复的一场大论争,这也是本书的论述中心之一。正是刘再复和李泽厚对“主体性”一词的广泛使用,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主体概念被排斥和遗忘了。^①人道主义所蕴涵的尊重人、把人当人看的以抽象的“人”和人类为中心的论述框架,其中心是个体主义的“人”的形象,同时也就把集体主义语境下,阶级的、政治的和国家

^① 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后面还将有论述。关于李泽厚的主体性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看顾昕:《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识分子——李泽厚研究》(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版)以及他的文章“Subjectivity, Modernity, and Chinese Hegelian Marxism: A Study of Li Zehou's Philosophical Idea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hilosophy East & West, April 1996, Vol. 46, Issue 2)。

的主体性思想的资源给掩盖了。这给人一种印象：只有属于个体的主体性才是真正的主体性，而集体主体、阶级主体和国家主体谈论的都是虚假的“伪主体性”。在80年代的语境下，主体性问题因此就和恢复大写的“人”的本来面目、重新找回人性的个体内涵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这种意义上，80年代的主体性话语风行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主动遗忘的过程。在为了主体、寻找主体、建构主体的过程中，新时期以前的主体话语被抛弃了，一个新时期的“新人”形象没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中形成，却在表面上以对抗的姿态出现的知识分子话语里生长起来。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是主体性话语的“主战场”，也正是靠这个不断生成和转型的话语空间，他们完成了前三十年没有完成的内在化的“新主体”的建造。

20年来主体性这个术语是怎么与中国当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又是如何融入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评论和创作的发展脉络的，这正是本书试图去阐释和解决的主要问题。80年代的文学话语与研究模式在90年代真的就完全失效了吗？本书试图以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心和契机，以能够连贯起两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概念为线索，部分地描述和解析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多重主体面向，也希图避开历史的间隙，寻找连贯我们当代文学历史与研究思路的方向。本书的中心是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主体性问题，而不是主体问题，不可能详尽描述众多的主体的塑造和解构，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发展是本书始终需要关注的对象。因为题目所限，表现出系统的反主体性倾向的先锋文学以及探索主体间性空间的文学试验和写作不作为论述的重点。这也许将是以后努力的方向。这次尝试不是要继续讲述文学领域的不断革命和创新的神话，不是要再次拿崭新的方法、理论和范式来整合当代文学的基本现实，而是尝试着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现实进程出发，呼应由它现有的本土问题与经验而产生的思想框架和批评资源，希望能够激发起一些深入的思考。

话语的变迁与主体问题的兴起

第一节 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向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人”的论述中，“人”的概念与人民群众的概念是基本可以画上等号的。相信“人”，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就是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革命“主体”的作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坚持唯物主义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的时候，人是决定的因素。其二，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观察“人”——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性的地位和创造性的力量。其三，在社会生产中，承认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人的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①在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是模糊的，这就使得在处理关于“人”——人民——“主体”的问题时，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

关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争论，即关于文学应该更注重提高还是更倾向于普及的争论，一直贯穿在 80 年代初期对文学艺术的各种新形式探索的诸多论争之中：在朦胧诗的论争、探索戏剧的论争以及引进现代派文学创作方法的讨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我们的研究一直注意的是在论争中一方所提倡的艺术探索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另一方则被描绘为因循守旧的阵营，然而仔细审视一下后者的意见，会发现他们的观点也并不是毫无内容：总体而言，反对大量引进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文学形式方面，很多人更重视维护文学趣味和服务对象上的共识，在这些人看来争论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没有“足够注意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人这个事

^① 黄宗汉：《论人是决定的因素》，《新建设》1965 年第 7 期。